

作家应该为自己制造一些传奇

徐贵祥本来起了一个笔名叫“边夫”，《小说林》的一位主编说，你老是到前线打仗，还是用本名好，富贵吉祥，听起来有点土气，但是安全。好在，徐贵祥喜欢上了文学，以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，把这个名字擦得闪闪发亮。徐贵祥凭借着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摘得了茅盾文学奖，而那一届入围并落选的还有莫言、贾平凹、李洱、麦家等作家。徐贵祥对此的解释是，探索人的奥秘，揭示人的真相，可能是《历史的天空》得到奖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徐贵祥另一个身份是军人，他做梦都想当英雄，但是英雄梦并没有实现，“既然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当不上英雄，那就让我好好地写写他们吧。”

本期嘉宾 徐贵祥 青年报记者 陈仓

1 作家应该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些传奇，这个我做到了。

青年报：徐老师，前几天你在（黑龙江）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采风，你说你的第一个中篇小说《征服》，是哈尔滨的《小说林》发表的，对你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。能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？

徐贵祥：说来话长，那是1984年夏天，我们野战军临时组建侦察大队，我当时是下金厂片区指挥组成员。我积极申请到前线去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——想当作家，想在前线体验战争生活。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在战斗间隙，在艰苦的环境里马不停蹄地写小说。那时候没有经验，只是凭借一腔激情，还有一种紧迫感，因为身处战地，今天脱了衣服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，有感而发，大大小小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，四处投稿，四处碰壁。一年以后，部队归建，我又写了一些作品。到了1985年年底，突然接到一件包裹，里面有二十本崭新的《小说林》杂志，打开一看，我的小说《征服》赫然出现在头条。

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，时任主编赵润华女士在信里说，这个作品早就发表了，按照稿件附注的通信地址，往前线寄了两次样刊，都被退回去了，几个编辑托部队的朋友打听我的去处，均没有消息，大家以为我牺牲了，很惋惜，因为他们感觉我有写作的潜力，又有战争生活体验，如果能活着回来，坚持文学创作，应该很有前途。后来有一天，又接到我的投稿，知道我尚在人世，喜出望外，所以多寄了一些样刊，稿费也开得很高。

青年报：据说，当时你用的笔名是“边夫”，是时任主编赵润华建议你用本名的。是这样的吗？

徐贵祥：是的。那次同《小说林》联系上之后，还通过电话，赵主编跟我讲了编辑部的同志对我的看法，对我创作能力的评估和期待。她告诉我，“边夫”这个笔名寓意固然很好，但是你身在军旅，老是到前线打仗，暂时还是用你的本名好，富贵吉祥。

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写信给家里，要他们注意一个笔名叫“边夫”的作者，那就是我。当时我的大舅并不想让我“改名换姓”，而小舅说，叫什么“边夫”啊，难道你打算一辈子留在边境线上吗？那时候，我对小舅的话不以为然，直到赵润华女士这么一说，我认真了，就一直用本名了。事实上，我也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，俗气就俗气吧，我能在俗气的起点上成为一个作家，更不容易。

青年报：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人的创作会产生影响吗？

徐贵祥：那是肯定的啊，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用笔名、艺名呢，有的寓意深远，有的有诗情画意，

至少会产生心理暗示。我感觉，我的名字确实不是太响亮，缺乏文化和艺术性，在早期投稿和参加评奖过程中，没有给我加分。我听说在一次评奖中，有个编委说过，这个名字一听就不讨人喜欢——我也不是很喜欢，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这是我的风格，已经很难改变了。如果因为我的名字俗气不受待见，额外遇到退稿，评奖受到冷落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

青年报：在你人生关键时期，赵润华老师算是对你有知遇之恩的，你和她见过面吗？

徐贵祥：没有。只是通过信、通过电话。你今天提出这个问题，我感到惭愧。的确，人生中有许多遗憾的事，让人悔之莫及。1997年秋天，《解放军文艺》组织去珍宝岛采风，途经哈尔滨，还住过一夜，我提出到《小说林》编辑部看看，被领队否定了。当时行色匆匆，也觉得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机会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没有机会了。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《那些帮助我们的人》，想起了这件事情，顺藤摸瓜找到了《小说林》当时的主编何凯旋，他告诉我，赵老师已经去世了。我当时就蒙了，悔恨交加。那几天，我翻箱倒柜，去找赵主编给我写的那封信，经多次搬家之后，找不到了。我只好自我安慰，那封信一定被我夹在某一本书里，安静地关注我的成长，等待我每一个进步的消息，也许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它会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青年报：你是安徽六安市霍邱县人，你的故乡可谓是人杰地灵，清朝著名文物鉴赏家、收藏家裴伯谦，清朝光绪年间的翰林院大学士李肖峰，左翼作家、诗人蒋光慈，鲁迅创办的六人未名社中就有“霍邱四杰”韦素园、台静农、李季野、韦丛芜。当然，你也被当地列为文化名人的代表。那里文化底蕴深厚，你的文学理想是这些人和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？

徐贵祥：先谈谈我对故乡的理解。故乡是离我们最近的生命记忆，也是我们回访历史所能抵达的最远的驿站。我当然不能同故乡的文化先贤相提并论，不过，生养我的姚李和洪集两个镇，都把我作为当地的优秀分子，就像我的老连队把我的照片挂在连队荣誉室一样。我的家乡确实名家荟萃，被称为“文藻之乡”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耳濡目染，受益匪浅。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是在一个特殊时期，在参军之前，我基本上是个半文盲。另一方面，又有幸和不少文学作品相遇。在我十岁左右，我们发现洪集镇老街有个土楼子，里面有收缴的各种被称为“四旧”的东西，而最让我们惊喜的就是有很多图

书，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，我对那些连环画如醉如痴。有些古典书和外国文学作品看不大懂，有一本翻译书，作者名字老长，字也认不全，我硬着头皮看进去了。这本书讲一个穷困潦倒的大学生成为罪犯，后来赎罪的故事。我在课堂上偷看，被老师没收了。我痛心疾首，反复回忆这本书叫什么名字，是谁写的。想来想去只记得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，因为不认识这个字，我就把它叫作“它的左耳”。

若干年后，我开始写小说，才找到这本书，“它的左耳”原来是“陀”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陀”。现在想想，我的童年就闯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，真是幸运得很。

青年报：1978年，你还不到20岁的时候，当兵入伍离开了故乡。当时为什么想着要当兵呢？进入军营，可以说是到处跑，这时候你是怎么理解故乡的？

徐贵祥：说到底，人生就是选择的艺术，有的选择是被动的，有的选择是主动的。我参军的原因是为了生活，因为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工作，成了待业青年，当兵是一条走向外面世界的途径。参军之初就遭遇了战争，这是被动的。好在我读过一些书，脑子里有一些精忠报国、马革裹尸的概念，表现得还不算很丢人，立了三等功，而且开始“舞文弄墨”。提干之后，第二次上前线，是我要求去的，是主动的选择。

关于故乡，我理解就是精神家园，一个人在精神发育的过程中，会去过很多地方，哪个地方给你留下更多的刻骨铭心的记忆，那里就是你的故乡。我的童年在安徽省霍邱县的姚李和洪集两个镇轮番生活，镇上的老街都给我很多文艺的启发。然后到了部队，最初的记忆是新兵宿舍里的一盆炉火，和炉火中前来查铺查哨的干部和老兵，他们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。还有，我在河南省确山县受过一年的炮兵专业训练，那是改革开放之初，我们几十个热血青年在伏牛山区摸爬滚打，超负荷训练，学习射击指挥、阵地指挥以及兵器操作、军事地形学。我把我学过的一点点东西，无限地放大，反复地转化成了文学作品。

再有就是云南麻栗坡县的老山了，我作为侦察大队一名基层指挥员，在那里度过了一年，结识了几百个生死之交，对于战争与文学都有深刻的体验。

一个作家，应该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些传奇，这个我做到了。在作家队伍里，写小说我肯定不是最好的。但是，我的炮兵指挥专业和侦察作战经历，在作家里面肯定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也决定了我的创作是独一无二的。

2 文学如果不去探究真相和揭示奥秘，那就没有价值。

青年报：你开始好像是写通讯的吧？你第一次和最近一次发表的文学作品各是什么？几十年过去了，你对比一下，变与不变的是什么？

徐贵祥：我是从部队土生土长的作家，我们那个时代的军队作家，大都有写新闻报道的经历，并非专业，而是基层业余写手。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报告文学《炮兵英雄王聚华》，王聚华是我一个连队的战友，被广州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，因为指导员发现我的请战书和遗书写得花团锦簇，认为我有文化，就让我来写这篇文章，也算是误打误撞吧。此后就一直坚持业余创作，写诗、写散文，后来集中写小说。小说写了几十年，从技术上讲当然熟练多了，被人称为“正面进攻军事文学的重型坦克”，“正面进攻”这四个字是我的老首长、军队评论家韩瑞亭最早提出来的，“重型坦克”这四个字是我的师友、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最早提出来的。在军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说独树一帜谈不上，但的确摸索出了一套特殊的经验。

现在年纪大了，老是喜欢回忆，从最近处回忆到最远处，童年记忆越来越清晰。最近的一次创作成果，是一部小说《老街书楼》。这才发现，写童年的记忆，写早期阅读，更有乐趣，也更加得心应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有新的发现，以往一直被认为贫寒、平凡的童年生活，竟有如此丰富生动的诗情画意。我觉得，这是最能体现我精神成长历程的一部作品。

青年报：你的代表作《历史的天空》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我们知道，你并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而你把这些战争写得活灵活现，人物栩栩如生，你是从哪里获得的认知和灵感？另外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除了《历史的天空》，还有熊召政的《张居正》、张洁的《无字》、柳建伟的《英雄时代》和宗璞

的《东藏记》。那一届入围的26部作品里，有莫言的《檀香刑》、贾平凹的《怀念狼》、李洱的《花腔》、麦家的《解密》，这些作家都是随后以其他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《历史的天空》最终脱颖而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？

徐贵祥：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还有一段几乎被忽略的经历，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之后不久，就从野战军调到解放军出版社，当过编辑、总编室主任、科技编辑部主任，前后十六年。在此期间，我奉命为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，牵头编辑出版洪学智回忆录，还参与几十名开国将军的回忆录和传记的编辑出版工作。在同将军们的访谈中，从历史资料的海量文字里，我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——真相。今天我可以这样说，我们过去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知，大多数来自于官方材料和文学艺术作品，触及真相层面，不少是模糊的、含糊的。在同年逾八十，甚至九十岁的老将军的接触中，感觉他们经常处在返璞归真的状态，经常处在讲真话的“冲动”之中，时不时地会披露一些曾经被人讳莫如深的细节。我非常幸运地被带入到这样一种触摸历史、感受历史真实的情境当中，每时每刻都在捕捉真相——战争真相、情感真相、人性真相、灵魂真相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年轻时就设定了他的创作圆心——探索人的奥秘、揭示人的真相，这个设定对我的启发意义重大，我正是带着探秘和揭示真相的目标去观察、想象、表现的，这可能就是《历史的天空》之所以能够得到奖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青年报：电视剧《历史的天空》火爆一时，获得了第25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，你觉得这是小说本身的功劳还是影视改编的功劳？

徐贵祥：电视剧同小说是两个艺术门类，但是一部好的小说，

